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鲜半岛的传衍

朱 冶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儒家伦理在东亚社会的传播过程中,教化性敕撰书的颁布和流传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明初编纂了多种类、面向社会各阶层的教化性敕撰书,如《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鹭》《五伦书》《历代臣鉴》等。这类书籍东传至朝鲜半岛,不仅影响着朝鲜王朝人士对儒家伦理观念的接受,还产生出《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海东臣鉴》等衍生性著作。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东亚汉文化圈的传播情形,实际呈现了儒家伦理纲常思想在周边诸国的下行与实践过程。

关键词:明代敕撰书;文化传播;朝鲜半岛;东亚汉文化圈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2)03-0235-07

明初自上而下重视教化性书籍的编纂、普及和推广。明太祖编纂了数量众多的教化性敕撰书,成祖、宣宗承继其后,亦撰修了种类丰富的教化用书。这些旨在训诫规劝臣民的教化性书籍,不仅在明代基层社会发挥显著效用,还传播至周边诸国,尤其在山水相连的朝鲜半岛发挥着深远影响。朝鲜王朝也因之出现衍生性教化书籍,如《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等,乃至采取本国例证进行续编和补益,以塑造和影响臣民的道德伦常与礼俗实践。既有研究已注意到《三纲行实图》等朝鲜王朝教化书的重要意义,且多从书籍编纂、内容体例、语汇图像等角度予以阐释^[1-2]。本文则回溯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东传过程,考察儒家纲常伦理以书籍为载体的传承脉络,探析朝鲜半岛衍生性教化书的发展特点与表现,以见明朝建国之初确立教化理念的衍生与回响情形。

一、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特点

明初重视编纂面向社会各阶层的教化性敕撰书,李晋华、朱鸿林等学者对此已有细致统计和研究^[3-7]。概言之,洪武朝敕撰教化书籍数量最多,明太祖编纂了以皇太子、藩王、后宫、文武官员、百姓为对象的各类教化用书,如《资世通训》《昭鉴录》《彰善瘅恶录》《臣戒录》《女诫》《武臣敕谕》《武士训戒录》,以及《皇明祖训》《大诰》等等。明成祖紧随其后,除编纂《永乐大典》《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大型文献类编或经典合集,还敕撰或颁赐《劝善书》《古今列女传》《为善阴鹭》《孝顺事实》等道德教化书籍。宣宗时期有《帝训》《外戚事鉴》《历代臣鉴》,以及宣德朝敕修未成、正统间完成的《五伦书》,倡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成化朝则有《文华大训》等。这些明初敕撰书特点鲜明,从形式到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和延续性。

如何行之有效地推广敕撰书所承载的儒家道德伦理,是明代官方教化活动中的重要命题。这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特点中已有体现,清晰简明的图示、朗朗上口的诗歌、生动富有意味的

作者简介:朱冶,历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朱鸿林工作室”特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与元明儒学传承研究”(13CZS016),项目负责人:朱冶。

故事,遂成为表述与宣讲时的首选。

儒家哲学中存在着图像表达的传统。不仅抽象的哲学义理,可以用图示来表达,如周敦颐《太极图说》及朱子后学《研几图》《四书章图》等经典诠释著作;儒家实践哲学中的伦理纲常,亦可通过图解的形式予以生动阐明,最早有孝子图及二十四孝图等。明初教化性敕撰书中蕴含的伦理纲常,在民间传播过程也容易演进为图像的表达形式。这在永乐朝敕撰书《孝顺事实》《为善阴鹭》诸书的衍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在流传过程中均产生了配图改编的新版本。与之相应的是,在圣谕宣讲的过程中,也常与教化性敕撰书结合起来,借用《孝顺事实》等书中故事配以图画流传。

除注重以图像来演绎人物事迹之外,明初教化性敕撰书也颇为注意诗歌、论赞的加入。以《孝顺事实》《为善阴鹭》为例,虽署名明成祖“御制”“御编”,实际是由明初永乐朝所培养的翰林官员编辑。书中采取“事—赞—诗”三层结构来展现,先博采历代孝行或阴鹭事迹,分类成卷,再逐个加以论断和诗赞。正是这部分论赞的引入,令其富含教化意味,并借助通俗简明的诗歌予以广传。譬如,《为善阴鹭》中“钟离悯恤”一条,诗曰:“钟离作吏处心仁,善政昭昭惠及人。青史无穷彰善誉,前年陈迹尚如新”^{[8]卷2}。值得注意的是,论赞这种形式的加入,与明初史学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王祎等人《大事记续编》等史书中均注意论赞的运用^[9]。

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编纂和颁行,还体现出明代政治文化的承继性与一贯性。上述帝王训诫及道德教化书在内容和体例上有前后相继的特点,显示明初形成的政治文化中儒家纲常的关键位置。其敕撰完成后,多颁赐文武群臣、国子监及全国府县学校,如《劝善书》《孝顺事实》《为善阴鹭》《五伦书》等,在府县方志中常见记载。由此,明代士人得以阅读到这些教化书籍,事实上他们还颇为重视书中承载的道德教化功能。明中期著名学者程敏政(1446-1499)就特别提到《孝顺事实》具有启迪民心的价值,他期望选取《孝顺事实》与《二十四孝》中的典型故事,通过编入诗词及民间曲艺的形式,从而使之传颂推广^{[10]卷54《复李宗仁太守书》,275}。

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流传中与地方教化活动的紧密结合,乃其又一显著特点。王演畴(万历二十年进士)的宗约会规中,即提出每月两会,择选约讲、约读在族内诵讲《大学》《孝经》《小学》及律法、《孝顺事实》《太上感应篇》诸书,以教化宗人^{[11]卷2《训俗遗规》,209}。晚明刘伯燮在为《乡约纂》作序时,亦提到采编《孝顺事实》《为善阴鹭》与《大明律》以整饬风俗的活动,“约行于乡,而法正于国”,两相配合,可以移风易俗,实现善治的情形^{[12]卷18《乡约纂序》,388}。明末吕维祺(1587—1641)也以《孝顺事实》为成祖以“孝治天下”的典范^{[13]卷18,459}。此外,明初教化性敕撰书还成为救荒书的取材来源^[14]。明正统间朱熊《救荒活民补遗书》,即是以“本朝列圣所下诏敕有关于荒政者,及采《为善阴鹭》所载前代救荒获吉之人续之,间以己意,为之论断”^{[15]卷8《救荒活民补遗书序》,504},编辑而成。

总之,明初洪武至正统间所编的教化性敕撰书,种类多样,特点鲜明,其内容以儒家伦理纲常的道德训诫为主体,体例上引入论赞、诗歌等形式,以助益其推广流传。明初教化性敕撰书旨在化民成俗,其在流衍过程中逐渐深入地方教化,融入图说、曲艺等形式,并与国家律法、乡规民约、圣谕宣讲、救荒赈济相结合,从而实现教化风俗的最终归趋。

二、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衍生

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多由颁赐形式进入朝鲜半岛,辅以民间传播渠道^[16]。多数教化性敕撰书,都在编纂完成不久即颁赐朝鲜李朝。其中,《孝顺事实》《为善阴鹭》《古今列女传》等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较早。譬如,永乐二年(1404)颁赐《古今列女传》,永乐十七年赐《为善阴鹭》,部分明初敕撰书还有多次颁赐朝鲜王朝的记录。

《五伦书》在成化五年(1469)颁赐朝鲜,《朝鲜睿宗实录》载“崔安、郑同、沈浚等,将皇帝别赐

《五伦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熟绢、象牙等物，诣阙。上具冕服，迎赐物，率百官入庭，行礼如仪。”^[17]卷4，睿宗元年闰二月壬戌《五伦书》亦在朝鲜使者的燕行文献中被提及，李朝后期学者李宜显(1669—1745)燕行中国时提到：“有南京僧持《五伦书》二套六十二册来售，粉纸大字，卷极大，以青布为衣，逐卷内踏正统皇帝御宝，甚可珍玩。而价极高不得买，可恨。”^[18]卷29《庚子燕行杂识》上，485以上记载可见中朝之间以书籍为媒介的文化交流。

事实上，朝鲜半岛在高丽时代已注重儒家伦理纲常，尤其是忠孝观念的推广。高丽忠穆王二年(1346)府院君权准，以及权溥、李齐贤(1287—1367)等编有《孝行录》一书^[19]。随着程朱理学的深入传播、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颁赐流传，朝鲜王朝的伦理教化思想亦更趋深化。朝鲜世宗(1419—1450年在位)敕撰教化用书《三纲行实图》时，曾训示臣子称：

三代之治，皆所以明人伦也。后世教化陵夷，百姓不亲君臣、父子、夫妇之大伦，率皆昧于所性，而常失于薄。间有卓行高节，不为习俗所移，而耸人观听者亦多。予欲使其特异者，作为图赞，颁诸中外。庶几愚夫愚妇，皆得易以观感而兴起，则亦化民成俗之一道也。^[20]卷首《三纲行实图序》

以上朝鲜君主效仿三代之治，明人伦以出治的宣示，与明初帝王训诫可谓如出一辙。由此可见朝鲜半岛所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价值理念层面，还包括国家治理的原则和方法。朝鲜国王的教化理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故其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基础上，又自编本国的教化性书籍，从而推行道德伦理与善行义举，化民成俗。

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影响下，朝鲜李朝君主开始仿照其体例及内容，编纂教化性书籍。朝鲜王朝所编纂的教化性敕撰书，自具特点。一是，类型与内容较为集中和单一，突出表现为对三纲五伦的关心和重视。君臣、父子、夫妇之纲，兄弟、师友之谊，均不出宋儒伦理之范围，然为朝鲜君主格外注意。二是尤其重视以图表意的表达方式，这虽在明代教化性敕撰书的下行过程中也有体现，却在朝鲜李朝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因循的“行实图”类著述。

朝鲜王朝敕撰的“行实图”，既有世宗朝《三纲行实图》，又有中宗朝《续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以及光海君命撰《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正祖朝《五伦行实图》等。其数量丰富，在朝鲜半岛流传广泛，编成后被颁予八道，李朝各时期又被多次翻印，刊印广布。对于这些“明伦之书”，朝鲜君主不仅重视其颁布，亦注重敦促其贯彻施行。究其原因，乃是朝鲜君臣对伦理教化在治国理政中重要性的深切认识。例言之，朝鲜中宗三十八年(1543)，对于教化不明之事，中宗训诫“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并格外强调颁布推行“行实图”意义。他提示不可令《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等教化性敕撰书徒为“虚文”^[21]卷100，中宗三十八年二月戊戌，更反复申述“时习以《三纲》《二伦行实》为不急，其弊大矣”的慨叹^[21]卷101，中宗三十九年正月乙丑。后世君臣也注意将前朝所编教化性书籍予以重刊重编，如朝鲜宣祖三十九年(1606)，司宪府以“明教化、淑人心”为国之先务，倡议重印《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诸书，宣祖予以肯定^[22]卷199，宣祖三十九年五月戊子，等等。由此可见，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鲜半岛的传衍过程中，逐渐发展出“行实图”的编纂传统。

三、李朝“行实图”的发展演变

“行实图”的产生，是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基础上逐步衍生而来，体现了朝鲜王朝对明初伦理教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朝鲜世宗十四年(1432)，朝鲜王朝前期著名文臣权采为《三纲行实图》所撰序言中，对此交代清楚，权氏称：

自中国以至我东方，古今书传所载，靡不搜阅。得孝子、忠臣、烈女之卓然可述者，各百有十人。图形于前，纪实于后，而并系以诗。孝子则谨录太宗文皇帝所赐《孝顺事实》之诗，兼取臣高祖臣溥所撰《孝行录》中名儒李齐贤之赞，其余则令辅臣分撰。忠臣、烈女之诗，亦

令文臣分制。编讫，赐名《三纲行实图》。^[20]卷首《三纲行实图序》

由此可见，《三纲行实图》主要根据《孝顺事实》的体例和内容而来。所不同之处是，结构增益为“图一事一诗一赞”的四层结构，内容有所增删，增入了部分新采集的中国及高丽、朝鲜人物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孝顺事实》一书的诗赞部分，乃是由永乐朝精心培养的翰林学士所撰写，代表着明初文教的新特点。以故，《三纲行实图》的诗赞情况也堪留意，它除采编《孝顺事实》中原有诗歌之外，还加入本国《孝行录》中李齐贤赞，以及朝鲜世宗朝文臣自撰诗歌；其自撰诗作也颇为通顺畅达，诗中多有倡议节烈的教化意味。

对比《孝顺事实》与《三纲行实图》的内容结构，颇可见明、鲜教化性敕撰书的侧重点所在。不同于《孝顺事实》在人物事迹之后，加以论断和评价，并顺理成章地引出“诗曰”作为结束，《三纲行实图》则是先以图画表达故事情节，然后简述人物事迹，再专列“诗”，最后列入“赞”的顺序，“诗”“赞”两部分皆以黑底白字加圈标识。具体而言，《孝顺事实》已有的条目内容，《三纲行实图》基本沿袭不变，只是调整顺序、略做删节。譬如“闵损单衣”条，《三纲行实图》在沿袭《孝顺事实》中人物事迹、诗歌之后，将《孝顺事实》中论断缩略重写为“赞”，篇幅大为减少。“子路负米”条，《三纲行实图》则在全袭《孝顺事实》中事迹之后，删去论断，而只保留“诗”的部分。整体来看，就两书共有的内容言之，一方面由于插图的引入和“赞”的删减，《三纲行实图》在《孝顺事实》的基础上更为生动简明；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诗”“赞”顺序调整，以及充满评判色彩的“赞”的删减去除，《三纲行实图》在语言的说理性与感染力上实则略逊于《孝顺事实》。

李朝学者普遍对教化书籍中的“行实”之“图”有格外用心。编修《三纲行实图》的楔循称，此书“谨类聚而成编，令文士著赞诗，俾画工成图像。善摹写其义烈，真仿佛其形容。将欲颁于国都，而遂及于闾巷。凡诸寓目，孰不竦心。庶见感激而熏陶，终臻鼓舞而于变。揭民彝、扶世教，幸亲睹于明时；遵王道、致时雍，期可传于永世”^[23]卷44《进三纲行实图》，期望通过将忠烈人物的故事绘制为形象的图画，从而使得百姓更易受到熏陶鼓舞。由现存《三纲行实图》来看，书中插图清晰简明，足令目不识丁的民众按图索意，受到感染和教化。

后世朝鲜王朝学者也对“行实图”的优势给予肯定。著名文臣李荇（1478—1534）即盛赞世宗朝编纂《三纲行实图》的价值与意义。他具体指明“行实图”的体例优长，在于“图像既肖其纤微，赞咏亦极乎褒美，不但钦想其面目，抑以感发乎性情。”^[24]卷9《进续三纲行实图笺》，⁵¹⁶换言之，以生动形象的行实图，配合触发读者性情的诗歌赞咏，确可帮助儒家伦理观念在地方社会的推行和贯彻。李荇参与编定的《续三纲行实图》，也都是依此方法和体例进行编纂的。

在《三纲行实图》的影响下，朝鲜王朝集中出现一系列以“行实图”命名的教化性敕撰书。《三纲行实图》的接续之作中，一部分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添入新人物、新事迹的“续三纲”系列；一部分是补备“三纲”所未有的所谓“二伦”“五伦”之作。前者有《续三纲行实图》《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等多种，后者以《二伦行实图》以及较晚的《五伦行实图》为代表。

举例而言，《续三纲行实图》由中宗朝文臣申用溉（1463—1519）等奉旨撰修，其中涵盖孝子图、忠臣图、烈女图等。前述李荇在《进续三纲行实图笺》中，提揭出中宗敕撰《续三纲行实图》对于先王之治的承续意义，并指明此接续之作的两大价值：一是续补《三纲行实图》之阙略。《三纲行实图》所载多是前朝之事，“止于宣德以上，非但未及于近世之事，亦多有漏于大明之初”，时隔百年之际，实需补辑晚近事迹以激励民众。二是仿照《三纲行实图》体例并有所发展。《续三纲行实图》一方面保留了“行实图”的体例，“摹形而纪其实行，悉遵世宗之前规”；另一方面“逐节而译以方言，并用成庙之遗式”，纳入了朝鲜成宗时期所发展的谚解形式，令此书更具普及性，能被更广泛民众所阅读^[24]卷9《进续三纲行实图笺》，⁵¹⁷。

朝鲜中宗时期敕修的《二伦行实图》，则旨在补益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之外的人伦关系。

实际上,早在15世纪中期,明朝敕撰的《五伦书》已颁赐朝鲜,《五伦书》中已颇为完备地涵盖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道。李朝《二伦行实图》的编纂则与朝鲜王朝著名学者金安国(1478—1543)的倡议直接有关。姜湏(1464—1519)于中宗十三年(1518)为《二伦行实图》作序称:

本朝《三纲行实》之书,既广布中外,人人皆知忠臣、孝子、烈妇之行为可仰也,莫不感激奋励,以兴起其善心。独于长幼、朋友二伦,未之见焉。今庆尚道观察使金公安国尝在政院,入侍经幄,请撰《二伦行实》,添续《三纲》,以备观感。上可之,下礼曹,令设局撰进。命未及行,而公出按于南。首囑前司译院正曹伸,撰集历代诸贤处长幼、交朋友,其行迹可为师法者,得若干人。于兄弟图附宗族,于朋友图附师生,纪事、图赞、谚译,悉仿《三纲行实》,刊于金山郡,请余为序。^{[25]卷1《二伦行实图序》,167}

尊敬亲长、以友辅仁是明孝悌、重人伦的重要内容,也是“三纲”的扩大和延伸。金安国主张编修《二伦行实图》,重在补益《三纲行实图》所未及的长幼、朋友二伦事迹,亦符合中宗朝“以教化为致治之先务”的施政理念。朝鲜君臣均对《二伦行实图》有所期待,希望它编成后“自当与《三纲行实》并行于世,为圣朝教化之基本,岂不美欤?”不过,与《续三纲行实图》一样,《二伦行实图》的体例亦因循《三纲行实图》并有所革新。其采用“图——事——诗——谚解”的体例,也即,以朝鲜语“谚解”取代了原有“赞”的部分。中宗朝《续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的体例变化,是朝鲜王朝教化性敕撰书在衍生过程中的新发展。

申言之,金安国提议《二伦行实图》,实则反映16世纪朝鲜王朝儒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社会教化的整体思考。其弟金正国(1485—1541)亦认为“三纲五常之道”的“日用之急,甚于水火”,以故其在选拔治国辅政人才的策问中,不仅阐明本国“行实图”的编纂传统,还结合实际以启迪朝鲜士子,指出“近年以来人纪不立,伦理灭绝。边将戮辱于西虏,麾下之士卒图为避免之计,无挺身赴乱之人,子而弑父者继作。至于都城之内,手刃无忌,妇而杀夫者,相踵而不绝。朋友相倾陷而失其信,长幼相陵暴而紊其序,以累我圣上中兴之治”^{[26]卷3《扶植纲常》,55}。可以说,金安国、金正国等学者均是从纲纪不立、伦常失序的社会现状出发,提出五伦和美的愿景,期望培养忠信之臣、孝顺之子、贞烈之妇、信义之友、礼让之族,从而重建伦理秩序,化民成俗,实现王化之治。

《三纲行实图》等教化性敕撰书的编纂和推行,是朝鲜王朝社会教化实践的其中一环。以金安国言之,他除倡议树立纲纪之外,对扶植彝伦、崇尚正学的事业亦多关注。金氏“令庆州、安东等五邑,刊书籍之有关于治道者凡十一。其曰《童蒙须知》,正蒙养也;曰《口诀小学》,培根本也;曰《三纲、二伦行实》,明人伦也;曰《性理大全》,崇正学也;曰《谚解正俗》《谚解吕氏乡约》,正乡俗也;曰《谚解农书》《蚤书》,敦本业也;曰《谚解疮疹方》,辟瘟方,救夭札也。”^{[25]卷1《二伦行实图序》,167}金安国的社会教化活动,面向社会多层次、不同群体展开,他通过刊刻多种经史书籍,推广农书、医书的朝鲜谚解,强调务实求用、实践施用。由此,既可较直观呈现16世纪初朝鲜王朝教化实践的多元举措,亦见教化性敕撰书在地方教化中塑造人伦纲纪的核要地位。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随着与地方教化实践相融合,朝鲜王朝教化性敕撰书也产生出新特点:其逐步叠加累积,不断合并刊行,最终形成集大成式的“五伦行实图”。自朝鲜中宗朝以降,各部“行实图”彼此相互叠加,或与《家礼》《小学》等文本相结合,产生出丰富多样的社会教化书籍。“行实图”在朝鲜半岛流传的过程中,既有《三纲行实图》或《续三纲行实图》与《二伦行实图》合刻的版本;也有《二伦行实图》与《家礼谚解》合刻的情况。直到18世纪末,朝鲜正祖李祘以教化乡里风俗为旨归,正式将《三纲行实图》与《二伦行实图》合编成《五伦行实图》一书。

正祖朝《五伦行实图》,是在朝鲜王朝历代“行实图”基础上,整理订正而成的集大成之作。其书卷首题“御制养老务农颁行小学五伦行实乡饮酒礼乡约纶音”,内容庞杂,乃是朝鲜正祖李祘治国理政之方的表达。正祖认为治国重在“观俗”,以故《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二书能够作为

“辅治励世之具”。其原意是将两书与《小学》合编,其后又体认世宗朝施行养老宴、颁行《三纲行实图》的深意,于是将乡饮仪式、乡约条例与《五伦行实图》共同颁布施行^[27]卷46,正祖二十一年正月壬寅,命沈象奎(1766—1838)、李晚秀(1752—1820)等朝臣润色考校、证订谚译而成。正祖重视民风、民俗的习养,以《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为“化民成俗之本”^[28]卷60《五伦行实图序》,252、“乡礼之羽翼”^[29]卷184《群书标记》,579,进而推动乡礼、乡约在民间的贯彻和实践。编成后的《五伦行实图》,其内容“上摭纯行夸节,旁搜卓烈懿范。传以记之,绘以象之,诗以咏之,赞以褒之”,旨在“使匹夫匹妇,一开卷、一涉目,油然起感,怵然兴惕,皆有以知其为臣忠、为子孝、为妇贞、长其长、友其友之为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然。不待司徒典乐之属,诱掖熏陶之功,贤者俯而就之,愚者跂以及之。”^[28]卷60《五伦行实图序》,253

实际上,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传衍,不仅对朝鲜王朝“行实图”系列书籍有塑造作用,还影响至“臣鉴”等多种体裁的教化用书的编纂和衍化。例言之,朝鲜正祖所编《海东臣鉴》,又名《东国历代及国朝名臣》,正是仿照明宣德朝《历代臣鉴》体例所编。《历代臣鉴》三十七卷,乃是明宣宗亲自采辑春秋以来群臣行事,颁赐群臣。朝鲜正祖御定《海东臣鉴》二卷,则是“起自弘儒侯薛聪,止本朝尹桀,凡一百九十一人。每人名下,注其字里爵谥,撮录其言行事迹之可为后人鉴法者,盖仿皇明宣德中所撰《历代臣鉴》之体例也,与桂坊李商逸对校数昼夜而书成。”^[29]卷179《群书标记》,487 此可见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鲜半岛流行而生的多重价值。

整体而言,朝鲜王朝教化性敕撰书呈现出以“行实图”为主流的鲜明特色,用以图配事的形式,宣讲儒家伦理纲常,辅以诗歌赞咏,乃至谚解,并逐渐辅翼于民间的礼俗实践。概言之,相较于明初中国编纂的教化性敕撰书,李朝教化性敕撰书更具普及性和实践性。各类“行实图”编纂完成后,颁行至朝鲜各地,对教化民众、化民成俗确有效果。检视朝鲜时代书目,在各道监营、乡校和书院的藏书目录中,以《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两书最多。^[30]“行实图”诸书的流衍及其成效,常见于李朝士人的记载。如,玄德升(1564—1627)曾记述乡里徐氏二孝子的“纯诚笃行”被采入《续三纲行实图》一书,由是激励“吾乡士子观感兴起,家曾而户闾”的场景^[31]卷4《徐孝子续三纲行实录序》。此可见官修“行实图”的流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乡里伦理道德的改善。再如,柳台佐(1763—1837)记载获赐《五伦行实图》之后,珍爱非常,诸位族人认真诵读此书的情形,称:“书册之赐,诵读不忘而教儿训孙,所以答其赐也。每于明窗之下,先君子正席以坐,先夫人盥手以跪读之。使诸子、诸妇、诸孙及族人男女,环坐以听,至或继晷而不倦。耳提之音,面命之训,尚了然在心目间。”^[32]卷9《内赐五伦行实图序》 由此及见此类教化性敕撰书,对修治家族伦理的有益影响。

四、结 语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伦理教化实践,不仅有着共同的孝行故事文本,还有着较为一致的教化思想和观念。朝鲜半岛自高丽时期即接受儒家伦理教育,高丽时代编纂了《孝行录》等教化性文献,随着明初敕撰书大量传入朝鲜半岛,《孝顺事实》《五伦书》《历代臣鉴》等倡导儒家忠孝伦理的教化性书籍受其格外关注。朝鲜国王娴熟掌握儒家治理思想,君臣上下无不赞同以“教化”为实现“至治”的先务,将教化臣民、树立彝伦为国治民安、效仿三代之治的必由之路。然朝鲜王朝所衍生的教化性敕撰书,又在承袭明初教化书籍内容和体例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特点。以“行实图”为特色的伦理教化书籍,辅翼谚解等内容,令此类教化性敕撰书更具简明生动的特色,辅翼于乡礼、乡约的地方化过程,助益于儒家伦理纲常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下行和实践。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鲜半岛的衍化现象并非偶然,还见于经史子集各类典籍的域外传播过程,体现了东亚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共性和差异性。

参考文献:

- [1] 任大援. 梵蒂冈藏中韩文对照本《五伦行实图》管窥[J]. 汉字汉文研究, 2010(6):135-152.
- [2] 赵正来. 中国《二十四孝》和《三纲行实图》中“孝”图像的叙事研究[J]. 中国文化研究, 2015(28):68-99.
- [3] 李晋华. 明代敕撰书考附引得[M]. 北京:哈佛燕京学社, 1932.
- [4] 朱鸿林. 明太祖的教化性敕撰书[C]//徐莘方先生纪念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577-600.
- [5] 周中梁. 明初敕撰教化书籍研究[D]. 香港:香港理工大学, 2018.
- [6] 陈时龙. 王恕的六谕诠释及其传播[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159-168.
- [7] 吴兆丰. 模范与教化:循吏文化与明中期镇守中官善政塑造[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169-176.
- [8] 朱棣. 为善阴鹭[M]. 刻本.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 1420(永乐十八年).
- [9] 向燕南. 论王祜的史学思想[J]. 学术月刊, 2002(3):67-74.
- [10] 程敏政. 篁墩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53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11] 陈宏谋. 五种遗规[M]. 北京:线装书局, 2015.
- [12] 刘白燮. 鹤鸣集[M].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5 辑第 22 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 [13] 吕维祺. 孝经大全[M]. 续修四库全书:第 151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14] 向静. 旌表义民与明代的乡村治理[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164-175.
- [15] 王直. 抑庵文后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41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16] 张升. 明代朝鲜的求书[J]. 文献, 1996(4):140-151.
- [17] 朝鲜睿宗实录[M]. 朝鲜王朝实录. 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1.
- [18] 李宜显. 陶谷集[M]//韩国文集丛刊:181. 首尔:景仁文化社, 1997.
- [19] 金文京. 高丽本《孝行录》与“二十四孝”[G]//韩国研究论丛.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273-287.
- [20] 倪循. 三纲行实图[M]. 东京:内阁文库藏朝鲜刊本.
- [21] 朝鲜中宗实录[M]. 朝鲜王朝实录. 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1.
- [22] 朝鲜宣祖实录[M]. 朝鲜王朝实录. 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1.
- [23] 徐居正. 东文选[M]. 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 1977.
- [24] 李荇. 容斋先生集[M]//韩国文集丛刊:20. 首尔:景仁文化社, 1988.
- [25] 姜湑. 木溪先生逸稿[M]//韩国文集丛刊:17. 首尔:景仁文化社, 1988.
- [26] 金正国. 思斋集[M]//韩国文集丛刊:23. 首尔:景仁文化社, 1988.
- [27] 朝鲜正祖实录[M]. 朝鲜王朝实录. 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1.
- [28] 李晚秀. 履园遗稿[M]//韩国文集丛刊:268. 首尔:景仁文化社, 2001.
- [29] 李祜. 弘斋全书[M]//韩国文集丛刊:267. 首尔:景仁文化社, 2001.
- [30] 张伯伟. 朝鲜时代书目丛刊[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 [31] 玄德升. 希庵先生遗稿[M]. 韩国历代文集丛书. 首尔:景仁文化社, 1997.
- [32] 柳台佐. 鹤栖先生文集[M]. 韩国历代文集丛书. 首尔:景仁文化社, 1997.

The Influence of the Books for Moral Indoctrination Writte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n the Goryeo Dynasty

ZHU Zhi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emperor promulgated and disseminated books for moral indoctrination, which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read of Confucian ethics in East Asia. These books were in various forms as well as facing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ncluding Emperor Mingzu's Guidance, Filial Piety Record, Altruistic Kindness, the Book of Five Lun and the Record of Historical Ministers. These books spread to the Goryeo Dynasty in the East, which not only affected the acceptance of Confucian ethics by people in the Goryeo Dynasty, but also produced derivative works such as Three Cardinal Guides, Two Ethics and The Record of Hai Dong Ministers and so on. The case study focuse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ose books in the Goryeo Dynasty and reveals the propagation and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East Asian society.

Key words: books for moral indoctrin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Goryeo Dynasty; East Asian Han Cultural Circle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